



王霸之道、中美竞争与新的世界秩序

漆海霞

进入 21 世纪,美国重返亚太、南海争端、中美贸易争端、对华科技封锁等现象纷至沓来,中国崛起与中美竞争将左右国际局势变迁成为国关学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关学界近些年来的关心议题与本国处境息息相关,例如,如何避免霸权衰弱?如何应用联盟有效制衡?如何在等级制体系中维持地位?显然,这些研究议题的出发点是美国视角。我国国关学界不能亦步亦趋,也要从中国视角思考我国国关学界的议题。因此,笔者试图从王霸之道和中美竞争的视角探索我国国关学界需要重视的研究方向。

一、王霸之道与大国崛起

自从道义现实主义提出大国领导力的类型可以划分为王、霸、强之后^①,我国先贤关于王道、霸道的争辩为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国崛起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②。王霸之道对国家崛起影响的经典案例是商鞅见秦王。商鞅最初用王道游说秦孝公失败后,改用霸道的富国强兵之法进行游说,取得成功。^③ 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然而秦国的快速灭亡一定程度上

① Yan Xuetong, "Chapter 2: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Preferences," i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5-53.

② 关于王道、霸道的分野,儒家讨论较多。例如,孟子曾经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参见《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指出:“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者道也”。参见《荀子·王制》。

③ 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同“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参见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也可以归咎于商鞅变法。法家强调刑罚,重罚轻赏。^① 商鞅为了强兵,采用军功爵制^②,一方面提升了战争获胜概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③;另一方面,在此制度的激励下,秦国好战暴虐,甚至出现白起坑杀长平投降赵卒的恶行。在秦朝的严刑酷法下,陈胜、吴广起义时的权衡就是无法如期到达依法当斩,起义也当斩,还不如起义。^④ 可见,法家对于百姓的苛刻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秦国崛起和灭亡的例子表明,王道、霸道的区别不仅影响崛起战略的选择,也会影响崛起的成败。由此,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可以思考以下问题: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哪些选择可以归之于王道,哪些是霸道?道德在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中起到什么作用?成功崛起的标准是什么?

在上述问题中,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成功崛起的标准或者说成为霸主国的标准是什么。现有的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国家整体实力和决定性战争中的获胜结果。然而,如果仅靠硬实力和战胜结果,就难以解释为何美国和苏联都是二战战胜国,却只有美国被视为冷战时期的霸主国,而苏联被视为崛起国。显然,除了国家实力和在决定性战争中获胜等标准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重要因素作为霸主国的必要条件。

结合春秋时期齐桓公被公认为五霸之首而郑庄公不被认可为霸主的正反对比,我们可以对上述问题做一探究。郑庄公没有成为公认的霸主,主要失误不是实力不够强大,而是公然挑衅周天子的权威。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其他诸侯讨伐郑国,但被郑国击败,周桓王受重伤。尽管当时周王室开始衰微,但是名义上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因此郑庄公此举不被诸侯认可。相形之下,齐桓公采用尊王攘夷的战略则取得更为成功的结果。齐桓

① 据《商君书·开塞》记载:“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商君书·赏刑》记载:“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

② 《商君书·境内》记载:“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夫劳爵,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能。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③ 《商君书·画策》。

④ 据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公登位之后,派隰朋朝见周天子。齐桓公五年,为了解决宋国内乱,齐桓公在征求周天子认可后,以王命号召诸侯参与北杏会盟,齐桓公在北杏会盟上被公推为盟主。

可见,成为霸主,除了硬实力和获得关键性战争胜利之外,还需要考虑抽象层面的因素,如合法性与其他国家的支持。在齐桓公与郑庄公的对比案例中,齐桓公称霸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因此其霸主地位具有了合法性,郑庄公则相反,缺乏合法性。因此,王霸之道带给我们分析权力转移和大国崛起等国际关系经典议题的新视角,激发我们关于成功崛起标准、崛起战略选择与成败等问题的新的思考。

二、合法性与大国霸权

基于王霸之道的比较分析可知,成功崛起需要具备合法性,那么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笔者认为,从获得方向上看,合法性可以自上而下获得,亦即来自天下共主或者最高权威的认可。此外,合法性还可以从平行方向获得,亦即来自其他同等身份国家的支持。在春秋时期,由于存在天下共主周天子,周天子的授权便是重要的合法性依据。例如,齐桓公采用尊王攘夷战略,尊王是尊崇周天子,攘夷则是承担国际责任,为当时的国际体系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如齐桓公帮助燕国抵抗山戎、使楚国进贡周天子,这些举措使齐桓公获得其他诸侯的共同支持。

然而,在当前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世界政府的存在,霸主国的合法性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在当前,国际组织、规范制度可能会成为合法性的来源渠道。

尽管国际组织不是世界政府,不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但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起到了凝聚各国共识的作用。例如,在2003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直接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师出无名,权威受损。而美国规避安理会的选择与当时法国、中国等大国在反恐立场上软制衡美国有关。因此,我国学界可以研究权力转移、大国制衡在国际组织中的

体现,如制度制衡或者软制衡^①,中美等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竞争策略、作用机理都是值得研究的议题。目前,我国已经有学者对联大投票进行了相关研究。^②

国际规范也是重要的合法性来源,道义现实主义强调的仁道,理想主义强调的道德,建构主义强调的规范,这些核心概念都与合法性或正当性有关,探究的是合法性来源与标准问题。然而,由于道德的具体内容存在各国差异,国际规范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也会与权力转移相互干扰,进而加剧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竞争。例如,一战后,霸主国英国提倡的均势理念的合理性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理想主义的挑战。二战后,英国同意殖民地独立,一方面与自身实力削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美国成功崛起有关,美国所倡导的民族自决成为国际普遍接受的主导规范,民族解放运动层出不穷,而英国的殖民地传统则被视为不公正的举措。可见,权力转移过程也往往伴随着崛起国与霸主国各自所倡导的不同规范之争。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之争和当前美国对我国的污名化事实上也是这一层面的竞争。因此,我国国际学界未来的可行议题包括:权力转移对规范演化的影响,崛起国的规范如何替代霸主国的传统规范,国际规则和程序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等。

三、中美竞争与世界新秩序

当前,新的世界秩序在各国互动中自然演化,中美竞争将对新的世界秩序形成重要影响。中美竞争目前看来可能不会短期结束,在此进程中,中美两国竞争领域是否会从经济、高科技领域蔓延到更多高政治领域?其他国家

①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p. 489-518;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② 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32—155页;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4—33页。

家在中美竞争中会如何选择？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会否延续？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效果如何？这些研究议题都与我国未来息息相关。

首先，基于前文王霸之道的辨析，霸权的获得不仅仅以权力转移中战争胜利为唯一标准，还需要考虑合法性等因素，因此中国崛起不要陷入美国现实主义“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①美国当前的遏制战略深受进攻现实主义影响，高度重视相对获益，将中美互动视为零和博弈。然而，借鉴郑庄失败而齐桓成功的经验，中国崛起需要考虑王霸之道的战略选择。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不等于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中美竞争不等价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弱，春秋时期晋楚共治的经验告诉我们，两大国也可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为世界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局面。^②因此，两大国如何实现共治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议题。

其次，中国的崛起不在于是否超越美国，而在于是否获得世界各国的诚心支持。管子有言：“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③借鉴齐桓称霸的经验，我国在崛起进程中也可以通过维护世界秩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措施帮助他国，获得各国认可。儒家推崇的王道精神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④，因此我国学界可以加强对于国际维和、国际冲突调解、对外援助等议题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对外援助存在换取国际影响之嫌疑^⑤，对于这类功利举动，我国应该避免。

概言之，未来的世界秩序演变取决于各国的选择，其中，我国和美国的选择将产生关键影响。新的时代为我国国关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议题：新的世界秩序如何演变？大国如何构建世界秩序？还有国际组织中的大国竞争、规范演化与大国合法性来源等等。因此，我国国关学界的研究议题要避免陷入美国国关学界之窠臼，而需结合我国实际面临的问题。在针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后，我国国关研究有望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助力我国和平崛起。

①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② 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54 页。

③ 《管子·霸言》。

④ 《论语·尧曰》。

⑤ Axel Dreher, Peter Nunnenkamp and Rainer Thiele, “Does US Aid Buy UN General Assembly Votes?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Public Choice*, Vol. 136, No. 1-2, 2008, pp. 139-164.